

# 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

## ——关于科技考古发展历程与经验的思考

□ 方 辉

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:“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,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,延伸了历史轴线,增强了历史信度,丰富了历史内涵,活化了历史场景。”可以说,科技考古在延伸历史轴线、增强历史信度、丰富历史内涵、活化历史场景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,其本体保存及展示也离不开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学科的作用。

近期,科技考古的价值在持续数月、由三星堆考古所带来的十大考古新发现,无论是专家解读,还是公众互动留言,这波“考古热”对“科技”在考古发掘和保护中的作用予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。

有媒体在分析三星堆祭祀坑受到重视的原因时指出,公众被三星堆吸引,不仅在于祭祀坑出土的贴金青铜面具、青铜树、象牙、黄金权杖等不同于中原王朝的奇异文物,显示了古蜀国独特的文化面貌,也在于三星堆考古“跨越多个领域运用科学技术等划时代方法取得的考古成果”,“这一考古成果有可能开创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的未来”。无独有偶,在不久前揭晓的2020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,也显示出科技考古在“探索未知,揭示本源”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。入选“十大”或现场演示的20项考古成果,无论是探测遗址与发掘中的遥感技术、数字技术,还是对出土文物所进行的古DNA、同位素科技分析,抑或是后期的文物保护,无不显示出科技考古的深度介入融合。科技考古所特有的实证研究和数字技术的应用,确实实实在在地“增强历史信度”“活化历史场景”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。正如在十大考古新发现终端现场一位点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,“科技为考古插上了翅膀”,包括三星堆遗址考古和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所有成果,都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,也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和发展

图书推介

## 《清代战争全史》与清史研究的新突破

改革开放40多年来,清史研究取得累累硕果,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,如清代军事史、战争史,以往多着眼于局部战争或重大战役,缺乏宏观系统研究。最近,李治亭、杨东梁主编的九卷本《清代战争全史》,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清代战争通史,是清史研究的新突破。

规模宏大,体例有所创新。该书分为9册,共330余万字,相较于以往其他断代战争论著,规模更加宏大;各卷最后附有“战役战斗名录”,共达364条;书中各类历史图片总计约300张,称得上是包罗甚广、内容丰富的力作。该书充分考虑清代战争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,立足空间地域,结合时间线索,兼顾战争类型,大力创新编撰体例。从纵向看,其时间脉络贯穿了清王朝的兴、盛、衰、亡全过程;从横向看,其地域范围涵盖了清代的边疆与内地,作者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辩证质疑,提出新解。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该书努力创新,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,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。第一卷《清统一战》,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的做法,而在开篇专列一章“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”,介绍时代背景,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

垫,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。第四卷《西南边疆之战》,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“水土恶劣,瘴气伤人”,导致清军“谈瘴色变,人人畏惧”,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,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。

## 海昏「慨口」本义探析

□ 赵 明

口”,应另有缘由。

“慨口”即“海昏江口”

由于长期的地壳运动,先秦秦汉时期的鄱阳平原,逐渐被北部彭蠡泽水侵蚀成为湿地,并在宋代形成季节性吞吐型湖泊——鄱阳湖(谭其骧、张修桂:《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》,《复旦学报》1982年第2期)。故宋代以来,学者对西汉时慨口一带的地理环境的认识已经不够清晰。

吴曾所谓的“慨口”与魏晋南朝以前的“慨口”并非同一含义。按《水经注》所记,“慨口”是豫水“东出豫章大江”之口(陈桥驿:《水经注校证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922页)。鄱道元生活的年代,鄱阳湖尚未形成,慨口显然不是吴曾所谓“豫章大江”之口,而是豫水向东流入豫章大江(即赣江)的河口。吴曾在此遗漏了一个关键的“出”字,后人沿用吴曾之说,每每将慨口说成是赣江水流入鄱阳湖的出口,这对于汉代地理而言,显然是一个重大误解。这一误解也有历史的原因。到南宋时,豫水下游的山川形势、河流走向,与汉晋南朝时期相比,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豫水除了北面的一条支流汇入修水以外,其向东南本流入赣江的南面一支,也因为鄱阳湖的形成,湖水上涨漫衍江河,其出水口则与赣江入湖的水道一同浸入了湖中,故吴曾所记南宋豫章大江之口,并非南朝时的慨口。

吴曾所称海昏县也并非西汉时的海昏县。他说慨口距离海昏县十三里,实际地理是指当时的赣江入鄱阳湖之口距建昌县(今永修县)为十三里,这一地名在宋代称作“慨口”,而未必就是南朝时期的慨口。《通鉴》胡注:“海昏县属豫章郡,后汉分立建昌县。宋白曰:今建昌郡,旧海昏县也;宋元嘉二年,废海昏县,移建昌居焉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五,中华书局1956年版,第831页)乐史注修水曰:“修水”东流原曲六百三十八里,出建昌城,一百二十里如彭蠡湖是也。”(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百六,中华书局2013年版,第2111页)《舆地纪胜》引《旧经》则云:“修水出豫章西北,其源自艾城东北,流六百三十八里至海昏,又流一百二十里入彭蠡湖。以其远而自达于江,故曰修水。”(王象之:《舆地纪胜》卷二十六,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1207页)可知四百年间的所谓海昏县实际上是指建昌县,两宋以后直至清代仍有人沿袭这种称谓。建昌县之沿革与海昏县的存废密切相关,两汉时期的海昏县与宋代建昌县治并非同一地望。

据《水经注》:“豫水又迳海昏县,王莽更名宜生,谓之豫水,又谓之海昏江。”(陈桥驿:《水经注校证》,第922页)海昏江亦可称为“海昏水”或写作“慨水”。谢钟英《三国疆域志补注》所引《水经注》之“豫水”则径作“慨水”(谢钟英:《三国疆域志补注》卷十二,清光绪间刻本)。“慨”既为“海”之音转,故“慨水”之义与“海水”相通,或为“海水”之俗写。“海水”亦即“海昏水”之简称。从海昏江之名可以推知“慨口”的本义。“慨口”乃“海口”之音转,“慨口”亦即“慨水”或“慨江口”之省称,其本义是指“海昏江口”,是海昏江出赣江之口,即豫水流向赣水的出口。与汉水流入长江之口,把汉江口称作“汉口”一样,海昏江口本应省称作“江海口”或“海口”,并非吴曾所说“今往来之不究其义”也。

总之,有关“慨口”得名于海昏侯的传说,不太可能现于西汉宣帝时期,所谓“慷慨”之言更不可能出自刘贺之手。但自刘贺封海昏侯于豫章以后,其身世跌宕起伏,愤慨不平之传言在当地应早已有之,反映出海昏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。同时,从“慨口”地望的不同记载,可以一窥今赣北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。汉晋南朝“总纳十川,同臻一渎”(陈桥驿:《水经注校证》,第923页)的赣江所穿行之鄱阳平原,到宋代已经淹没于湖水,原来流入赣江的多条河流(包括豫水)都汇入了鄱阳湖。“慨口”这个地名的本义,也被所谓海昏侯故事掩盖了上千年,应该予以辨正,还其历史真相。(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,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(16@ZH022)阶段性成果)

史學

理论部主办 电话:67078942

(孔勇)